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经验国际化初探^{*}

周家彬

【内容提要】中国经验国际化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伴而生的另一个历史进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有益思想和理论，这些思想和理论曾对共产国际乃至整个国际共运产生了重要影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经验国际化可分为萌芽、起步、发展和自觉四个阶段，在历史上形成了许多重要的特征。对于中国经验国际化的探讨有利于我们从历史维度进一步认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特别是对于了解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础上形成的中国经验何时开始走向世界、如何走向世界以及中国经验走向世界背后的历史必然性等问题有所启迪。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共产国际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经验国际化

作者简介：周家彬（1990-），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研究人员（北京 100872）。

关于国际共运对中国革命的影响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内涵、依据等问题，学术界已有充分的研究，但关于中国革命对国际共运的反馈与影响，学术界研究不多。部分研究者已经意识到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曾对国际共运产生重要影响，如美国学者亚历山大·库克（Alexander C. Cook）认为，毛泽东思想对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印度、秘鲁的共产主义运动有直接而深远的影响；中国学者牛军提出，新中国成立后抗法援越的实践是中国在越南推广中国革命经验的努力^①。现有研究几乎都聚焦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且大多是具体案例的梳理，较少关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经验国际化的历程及其背后的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经验国际化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另一个历史进程，主要指中共在革命探索中形成的有益思想和理论，并通过一定渠道逐步向国际共运推广，影响共产国际甚至整个国际共运，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本文尝试从历史过程、主要特征、基本依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经验国际化关系等问题入手，探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经验国际化问题。

一、中国经验国际化的基本历程

根据中共发挥作用的方式及其自觉程度的差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经验国际化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1921—1922年、1922—1928年、1928—1940年、1940—1949年。1921—1922年，中共主要通过共产国际联系紧密的党员个人参与中国经验国际化进程；1922—1928年，中共党组

^{*} 本文系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共革命经验对共产国际理论影响研究（1921—1943）”（18CDJ012）的阶段性成果。

^① 参见牛军《冷战与新中国外交的缘起：1949—195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64页。

织开始在中国经验国际化的过程中发挥作用；1928—1940年，推动中国经验国际化逐步成为中共有意识的举措；1940—1949年，中国经验国际化的地位得到国际共运的认可，中共更加自信和自觉地向各国直接推广中国经验。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1922年共产国际“四大”的召开是中国经验国际化的萌芽阶段，中共推动共产国际改变了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类型的认识。1920年，共产国际“二大”将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分为先进国家与落后国家两类。土耳其等近东国家被视为封建关系占优势的落后国，中国、印度等远东国家则被视为资本主义制度占统治地位的先进国家^①。受此影响，中共“一大”主要将本国资产阶级视为革命对象。1921年，张太雷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在共产国际“三大”提出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三分法”：先进国家、初步发展国家与落后国家，并将中国归入初步发展国家^②。1922年，共产国际“四大”正式认可了张太雷的“三分法”，与会代表认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可划分为三类“资本主义相当发达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已经开始，但还处在低水平阶段上，封建主义仍然是社会主要支柱的国家”，以及“原始关系还占统治地位，社会制度还是封建的宗法制度”的国家。会议通过的《东方问题指导原则》承认，“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多样性”，明确指出这种多样性“反映着殖民地正处在从封建关系和封建宗法关系向资本主义过渡的不同阶段”^③。由此可见，中共成立之初，部分党员就已经开始根据自身经验推动共产国际相关理论的发展和完善。

从1922年共产国际“四大”到1928年共产国际“六大”是中国经验国际化的起步阶段，中共对中国经验国际化的参与由党员个人行为转变为党的组织行为。在此阶段，中国“大革命”促使共产国际转变了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运动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认识。共产国际成立之初虽要求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党保持组织上的独立性，但在理论上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认识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在实践中也没突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1925年初，中共“四大”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并在随后爆发的五卅运动中实践了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斗争。在此之前，罗易曾多次提出将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置于本国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主张，但由于缺乏印度革命实践的支撑，对共产国际而言罗易的意见仅仅是空谈。中国“大革命”的实践则改变了共产国际的认识。1928年共产国际“六大”强调，中国“大革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运动的宝贵经验，并在借鉴中国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明确要求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党争取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④。共产国际“六大”后，领导权问题逐步落实，印度、印度支那等国家和地区共产党纷纷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写入革命纲领。在此阶段，中共党组织开始在中国经验国际化中发挥作用，但中共对中国经验国际化进程的参与属于自发行为，中共提出新思想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改变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看法而非影响其他国家的革命运动。

从1928年共产国际“六大”到1940年是中国经验国际化的发展阶段，中共开始有意识地向国际共运推广中国经验，这集中体现为中共在推动共产国际转变对“苏维埃”的认识上。“苏维埃”曾长期被国际共运视为无产阶级专政的象征。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中共曾提出利用“苏维埃”向无产阶级专政迅速过渡，中共“六大”与共产国际“六大”都曾重申“苏维埃”与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联系。随着工农武装割据的发展，中共逐步意识到在当时中国既不能立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也

① 参见《列宁斯大林论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50—53页。

② 参见《张太雷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7—34页。

③ 王学东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35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43—46页、第578—584页。

④ 参见王学东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48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第433—434页。

不能在“苏维埃”基础上实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快速过渡，“苏维埃”不仅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象征，也是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形式，并且工农民主专政具有长期性、稳定性，如1931年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①。1933年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上正式提出，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苏维埃”不仅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形式，而且也是工农民主专政的最好形式，中国经验“不仅对于印度支那、印度、朝鲜、台湾、古巴和整个殖民地世界的人民有所教益，而且对于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员，首先是日本、西班牙等国的同志，也是一种丰富的经验教训”^②。大会报告最初仅强调“苏维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形式，后在中共代表意见的基础上进行修改，肯定“苏维埃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也是“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民主专政的国家形式”^③，相关内容随后又成为共产国际决议。此后，“苏维埃”的新内涵在国际共运中得到逐步推广，例如1935年苏联出版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前的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执委会提交给共产国际“七大”的工作报告等都对“苏维埃”新内涵加以肯定。在此阶段，中共对中国经验的提炼已经不再仅仅着眼于中国，而是立足于整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运动，中国经验国际化开始成为中共的自觉行为。

从1940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经验国际化的自觉阶段，中国经验国际化得到国际共运的认可，中共逐步将推广中国经验视为自身的责任。这一时期中国经验国际化的内容逐渐系统化，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共运中影响力逐步扩大。此外，中国经验国际化开始越过共产国际，传播路径由中国——共产国际——他国的间接路径转变为中国——他国的直接路径。1940年2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布《关于中共向远东和东南亚国家共产党提供国际援助的决定》，要求中共支援和指导日本、印度和印度支那等东亚和东南亚共产党的革命运动，这表明国际共运公开承认中国经验国际化的重要性^④。1941年10月，中共在延安召开有日本、印度、印尼、越南等国家和地区代表参加的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成立了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后，中共通过与许多国家的直接联系继续推动中国经验的国际化，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开始成为中国经验国际化的重要内容。1946年12月，胡志明领导越共为争取越南独立同法国殖民军作战，运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将革命分为民族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部分，并模仿“延安整风”进行“改造教育”，还仿效中国在其控制地区进行土地改革^⑤。1948-1949年，印度共产党也逐渐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作为印度革命的指导方针，还曾称“殖民地世界的各国共产党都把中国共产党看成是它们的榜样”^⑥。1949年刘少奇访问苏联时，斯大林再次肯定了中国革命和中国经验在整个国际共运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中国今后多担负些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方面的帮助，因为中国革命本身和革命经验会对它们产生较大的影响，会被它们参考和吸取”^⑦。刘少奇在世界工会联合会亚洲澳洲工会会议上宣布，中国经验将为其他国家民族解放运动提供重要参照，中国革命道路“可能成为情形相类似的其他殖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772-774页。

② 姚金果、陈胜华编《共产国际与朱毛红军（1927-1934）》，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351页。

③ 王学东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55（2）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第654页。

④ 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9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第18-19页。

⑤ （美）阿里夫·德里克等主编《毛泽东思想的批判性透视》，张放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65-272页、第283-291页、第304-307页、第413页。

⑥ （美）琴·D. 奥佛斯特里特、〔美〕马歇尔·温德米勒《印度的共产主义运动》，北京编译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354、369页。

⑦ 《我的一生：师哲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09页。

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争取解放的基本道路”^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经验国际化经历了萌芽、起步、发展到自觉四个阶段，实现了由个人行为到组织行动、由自发行为到自觉行动、由零散经验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由间接路径到直接路径的转变。在此过程中，受到传播路径与内容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经验国际化的影响范围和实践效果也呈现出阶段性差异。前三个阶段中国经验国际化主要是中共先影响共产国际，再由共产国际影响其他国家，经共产国际提炼后的中国经验更强调普遍性和抽象性，与第四阶段相比影响范围更广但缺乏针对性。由于各国需要时间消化这些抽象经验，中国经验国际化在短期内也很难产生明显的效果。第四阶段的中国经验国际化更具目标性，主要针对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同时，中国经验本身更加系统化，既有抽象的理论也有操作性较强的策略，再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便利的地理条件，第四阶段的中国经验国际化推动了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快速发展，尤其体现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越南抗法战争中。从历史进程来看，中国经验国际化贯穿于中共及其领导的中国革命全过程，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组织没有采取固步自封的态度，更没有排斥新的革命经验，而是以开放的态度面对国际共运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接受甚至推动了中国经验的国际化。

二、中国经验国际化的特征分析

在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经验国际化的基本历程后，下一个问题就是解析中国经验国际化的主要特征，即其主体、对象、内容、路径与结果。本文尝试通过中共推动国际共运转变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无产阶级领导权认识这一案例，分析中国经验国际化的相关特征。

共产国际成立之初，虽然要求殖民地、半殖民地各国共产党在民族解放运动中保持组织上的独立性，但由于各国共产党创建时较为弱小，因此在实践中多将共产党定位为推动者、辅助者和监督者，民族解放运动实际的领导者则是各国民族资产阶级。如凯末尔曾压制土耳其的共产主义运动，但共产国际仍旧要求土耳其共产党支持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②。随着中国“大革命”的发展，中共逐渐形成了新的认识。1925年初，中共“四大”提出了民族解放运动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在同年10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上，进一步将其明确为“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的领袖地位”^③。此时，共产国际虽然一方面承认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已经觉醒，是民族解放运动的基础力量，但另一方面又否认中国无产阶级已经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取得领导者的地位。

中国革命的迅速发展使共产国际逐步转变认识。1926年11月29日，在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全会上，谭平山代表中国共产党作中国问题的报告，提出中国无产阶级在五卅运动中已经开始掌握革命的领导权，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还未最终确立，因此提议共产国际支援中国无产阶级夺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④。许多与会代表对此表示支持，斯大林在大会发言中曾明确提出，中国革命应重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⑤。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全会最终通过了《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任务》

①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64-165页。

② 参见王学东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35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88-91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475页。

④ 参见王学东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43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第541-546页。

⑤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68-269页。

和《关于中国局势的决议》等文件，将无产阶级争取领导权视为“决定中国革命策略的基本原则”，指示中共“把中国的无产阶级打造成中国革命领导人的角色”^①。

共产国际“六大”把中国革命较早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视为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宝贵经验。红色工会国际书记洛佐夫斯基表示，“最近三年中国的革命斗争积累了丰富经验，需要用很长时间来消化它”，在各项经验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②。最终共产国际“六大”通过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的决议，强调中国革命形成的关于无产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中领导权问题的经验应该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所学习，各国革命必须努力争取无产阶级的领导权^③。

共产国际“六大”后，殖民地、半殖民地各国共产党纷纷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如1930年，印度共产党发布《共产党人在密拉特法庭的声明》和《印度共产党行动纲领草案》，要求在共产党旗帜下动员工农，发起反对本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斗争^④。又如，印度支那共产党根据共产国际“六大”指示，于1930年召开中央常委会，所制定的革命纲领鲜明地提出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⑤。再如1931年，菲律宾共产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菲律宾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明确提出将本国资产阶级作为革命对象^⑥。中共的革命领导权理论来源于国际共运，并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随后通过共产国际这个平台向国际共运输送新的经验、思想和理论，中国的经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整个国际共运转变了对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的认识。

基于上述案例，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经验国际化在主体、对象、内容、路径与结果等方面的主要特征有如下几点。

(1) 中国经验国际化的主体呈现多元化的特征。创造中国经验的主体主要是中共，但在其国际化过程中主体大致可分为三种，即中共、共产国际与其他国家共产党组织。不同主体既可以在不同过程中各自发挥作用，也可以同时发挥作用。例如，国际共运转变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无产阶级领导权认识的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中共向共产国际推广中国经验的阶段，在此阶段，中共是中国经验国际化的主体；第二部分是共产国际向其他国家共产党推广中国经验的阶段，共产国际则是这一阶段的主体。

(2) 中国经验国际化的对象主要有两种，即共产国际与其他国家共产党组织。正如某个具体过程中可能存在多个主体，中国经验国际化某个具体过程的对象可能是共产国际，可能是某国的共产党组织，也可能两者都是对象。中国经验国际化的主体与对象具有相对性，在一定情况下可以相互转化。在中国经验国际化过程中，除中共没有成为对象以外，其他的主体都曾成为对象。在某些情况下，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组织还可能实现主体与对象之间的转化。例如，共产国际一方面接受中共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认识，成为中国经验国际化的对象；另一方面，又推动其他国家共产党组织接受这一认识，扮演着中国经验国际化主体的角色。

(3) 中国经验国际化的内容主要是思想和理论。中国经验的国际化在本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中

① 王学东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44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第567-620页。

② 参见王学东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47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第459-472页。

③ 参见王学东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48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第410-411页。

④ 参见（奥）尤利乌斯·布劳恩塔尔《国际史》第3卷，杨寿国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第289页。

⑤ 参见（越）陈辉燎《越南人民抗法八十年史》第2卷（上），北京大学东语系越南语专业译，北京：三联书店，1974年，第37-39页。

⑥ 参见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第5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04页。

国化成果的国际化，这些成果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产生的思想和理论。斯大林曾将国际共运的理论体系划分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战略”和“策略”四个层级，其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指的是马克思对共产主义革命必然性的论述，即“资产阶级必然崩溃，无产阶级必然夺取政权，资本主义必然由社会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是“从理论原理出发，确定无产阶级运动的目标”，包括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揭示革命不同阶段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当时的革命性质、对象、动力、目标和前途。“战略”是“运动所应遵循的基本方向”，为实现纲领而选择的革命形式、革命道路等。“策略”是落实“战略”采取的具体措施^①。“理论”“纲领”“战略”和“策略”是国际共运中经常使用的理论分层方式，这类划分也经常见诸中共的文件和领导人的文章之中，例如“一大”“二大”纲领等。中国革命并未修改“理论”，更多的是对“理论”的应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经验主要集中于“纲领”一级，中共曾通过介绍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目标和前途为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提供借鉴和参考，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就属于这一层级。当然，中共的“战略”和“策略”，特别是武装斗争也曾被作为重要经验推广到其他国家，但历史证明，这两个层级的经验并不适合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纲领”一级的经验更具普遍性。

(4) 中国经验国际化的渠道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间接渠道，即中共先推动共产国际一类的国际组织接受中国经验，然后在此基础上由共产国际等国际组织向其他国家推广中国经验。中共推动国际共运转变对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认识采用的就是间接渠道。另一种是直接渠道，即中共与其他国家不通过任何中介直接产生联系，中国经验直接从中国向其他国家传播。20世纪40年代，印度、越南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直接学习就属于这一类。

(5) 中国经验国际化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国际推广，以及在此基础上国际共运的发展与马克思主义的丰富。随着实践的发展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水平的不断提升，中国经验的水平也不断提升。20世纪40年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成果——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经验的主要内容，中国经验的国际化升级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化，中国经验国际化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三、中国经验国际化的理论解析

中国经验国际化不仅是一个历史现象，更带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存在于中国经验国际化产生的现实依据、理论依据及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之中。

中国经验国际化是帝国主义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和国际共运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共产主义事业发展的现实需要。共产国际成立之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一直未被纳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中。列宁提出帝国主义理论，认为资本主义迟迟不能推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帝国主义时代的到来。帝国主义国家通过剥削殖民地、半殖民地获得高额的利润，一方面使统治阶级发财致富，另一方面补贴本国的工人，以此抑制工人运动。因此，列宁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反帝斗争视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部分。但对于如何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开展革命，国际共运并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参考。中共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上探索出的中国经验恰好为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参照。对于中国经验的重要性，共产国际早有认识，如1928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库西宁和红色工会国际书记洛佐夫斯基等人就曾在共产国际“六大”上呼

^①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33-137页。

吁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学习中国革命的经验^①。

中国经验国际化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要求。第一，马克思主义强调国际性与民族性的统一。近代以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扩张，世界原先相对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国家、民族之间逐渐建立了普遍而频繁的联系，一个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世界体系逐步形成。正如马克思所言“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②到了帝国主义时代，列宁进一步将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纳入国际共运的视野。在帝国主义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逐渐沦为帝国主义国家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成为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组成部分，各国在革命目标、对象、动力等问题上存在很多相通之处。当然，每个国家由于具体国情、民族特征等问题不同也存在差异，但这种差异是世界整体性基础上区域性、民族性的差异。中国革命与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之间的广泛联系与诸多相通之处是中国经验国际化的重要基础。

第二，马克思主义强调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科学理论就是因其理论本身具有普遍性。马克思主义用普遍性的眼光来认识世界、研究世界，研究的对象也多是普遍性问题，形成的科学理论被用来揭示一般规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是中国对普遍原理的具体应用。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就是“国际主义的内容”加“民族形式”^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非要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也不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转变为狭隘的民族性的或区域性的理论。虽然中共在实践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过程中采用了符合中国国情和民族特性的革命方法，但其革命目标、价值追求、理论内核、认识框架、分析工具等都来源于马克思主义，都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正如毛泽东所言“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④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不是要降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地位，而是要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更好地用普遍原理指导实际工作。马克思主义规定着中国化的性质，离开了普遍性、国际性的马克思主义属性，中国化就会滑到其他性质的理论体系中。中国经验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探索出来的成功的思想和理论，是在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国际共运一般规律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同样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特点。

第三，马克思主义强调坚持与发展的统一。恩格斯曾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⑤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建立在理论与实践辩证统一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要随着实践，特别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不断前进。中国作为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阵地，在革命实践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中国经验，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进。中国经验国际化的过程体现出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统一。

在分析中国经验国际化的理论依据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经验国际化的相互关系就成为一个必须回答的重要问题。总的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经验国际化的基本前提，中国经验国际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和必然结果。

① 参见王学东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47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第29-30页、第459-460页、第471-47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7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4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91页。

其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经验国际化的基本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正如毛泽东所言“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解决实际问题，在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产生新的经验，是其两个重要内容。一方面，“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为中国经验国际化提供了理论基础与实践基础。中国经验归根结底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具体运用和发展，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议题内的探索和发现。另一方面，“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为中国经验国际化提供了核心内容。中国经验并非是理论推演的产物，而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结果，中国革命只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才能产生新的行之有效的思想和理论。

其二，中国经验国际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和必然结果。中国经验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其国际化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向国际传播的过程。并且，中国经验国际化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毛泽东思想诞生前，中国经验的内容比较零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成果——毛泽东思想诞生后，中国经验就作为一个完整而系统的理论体系而出现，中国经验国际化的过程就逐步转变为毛泽东思想国际化的过程。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系统化的中国经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际化是中国经验国际化的高级阶段。两者主要有三个重要区别：其一，对应的历史阶段不同。在当代语境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对应的时间主要是1978年至今。即使将毛泽东思想的国际化纳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际化，其对应的时间范围也应是20世纪40年代至今。而中国经验国际化是从中共创建至今一直存在，因此中国经验国际化在时间范围上大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际化。其二，国际化的内容不同。虽然两者的前提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际化更强调成果的系统性，中国经验国际化则既包含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包含在此之前的零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其三，理论的预设不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化强调中国在探索自觉阶段对世界的影响，将中国向世界推广自身经验作为中国走向自觉的阶段现象。中国经验国际化则是将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作为一个持续发生的历史进程，更强调中国经验走向世界这一过程的持续性和必然性。

综上所述，国际共运与中国革命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将之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之外，还积极探索成功的思想和理论，将中国经验反馈给国际共运，使其成为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来源。中国经验国际化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伴而生的一个重要历史进程。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时，我们应从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出发，既关注中国向世界的学习，也重视中国对世界的影响。

参考文献：

- [1]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
- [2] 俞吾金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化》，《现代哲学》2009年第1期。
- [3] 牛军 《冷战与新中国外交的缘起：1949—195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 [4] 〔澳〕尼克·奈特 《再思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探索》，闫方洁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
- [5] Alexander C. Cook (ed.), *Mao's Little Red Book: A Global Hist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编辑：张 桥)

^① 《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08页。